

章植与中国第一部《土地经济学》

张清勇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 研究目的:研究章植的生平及其所著《土地经济学》的价值。研究方法:通过文献分析,整理章植的生平,讨论其对土地经济学的贡献。研究结果:章植1930年出版的《土地经济学》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土地经济学著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研究结论:章植及其《土地经济学》在中国土地经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 土地经济学;章植;中国

中图分类号:F3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58(2010)12-0064-06

Chih Tsang and His Monograph: the First *Land Economics* in China

ZHANG Qing-yong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paper are to explore the life of Chih Tsang and assess the value of his monograph named *Land Economics*. Method employed is to analyze Chih Tsang's life and discuss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science of land economics via document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hih Tsang's *Land Economics* published in 1930 was the first Chinese monograph on land economics with obviou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t academic value. It is concluded that Chih Tsang and his *Land Economics* occupy important positions in the history of land economics in China.

Key words: land economics; Chih Tsang; China

1 引言

章植(Chih Tsang, 1907—2005),字午云,“中国第一部土地经济学”的作者。1907年11月7日,章植出生在无锡进士坊巷,排行第二,乳名宗儿。章植“自幼即用功勤学,自小学、中学至大学成绩优良,常名列第一”。1924年,章植考中上海圣约翰大学,一年后转学复旦。在复旦,他成绩优良,连年获得奖学金,1928年以文科经济系第一、英文会考第一、全校各学院成绩第一的成绩毕业,三次上台领奖,接受主持毕业典礼的胡适先生的热情握手祝贺^[1]。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后,章植本想“到美国读博士学位”,但考虑到“自费是承受不了的,一定要等待政府选派公费出国。所以留校做助教、继续选读学科最为适宜”,便留校担任大学部职员,任学长室理,同时任大学部教员,讲授英文作文,第二年派任经济学助教^[2]。他还加入了中国经济学社,常参加活动,撰写文章^[3]。在随后的几年里,章植在《经济学季刊》、《地政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文、书评,校阅了邹宗儒等译W. Smart的《价值论概要》,与区克宣合译M. Knight的《近代欧洲经济史》。

收稿日期:2010-09-29

修稿日期:2010-11-11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作者简介:张清勇(1980-),男,福建金门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学。E-mail: qingyongzhang@hotmail.com

在章植的众多论著中，《土地经济学》一书最为突出。宋涛在《20世纪中国经济学研究》一文中指出，“1930年章植所著《土地经济学》一书，是中国学者所撰写的第一本土地经济学著作，它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土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4]胡跃高写到，“在中国，土地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河田嗣郎著《土地经济论》的中译本于1930年出版，同年章植著《土地经济学》一书出版。这两本书在中国的面世，起到了启蒙的作用。”^[5]周诚也指出，“同年，章植著《土地经济学》问世，这是中国学者所著的第一本土地经济学教科书，它开创了中国经济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新纪元，该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土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外实际进行分析，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6]本文尝试探讨章植的生平及《土地经济学》一书的写作经过，引述学界对章著《土地经济学》的评价，讨论章植的贡献及其著作的价值。

2 《土地经济学》的写作和出版

据章植回忆，离校任教后，“我读了许多经济书，深知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村经济。因为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靠种田维生，不提高农村经济水平，无法复兴中国。所以，我决心要写一书，专讲土地经济调整。”^[7]他回忆道，“我主张农地私有，耕者有其田，市地公有，要统筹使用，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相近。并且主张要彻底解决农业水平必须发展工业，国家工业化了农业水平必将提高。”^[8]为了写作《土地经济学》，章植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每天完成教学任务后，即埋头写作，常到深夜。整整一年，才把书写成。名为《中国土地经济学》，共五十万字。为了写书把计划中要参加的留学考试也放弃了。我把书给一位教务主任孙先生看，他读后大为赞赏，推荐给黎明书局出版。”^[9]

表1 章植有关土地经济的部分著述

Tab.1 Some of Chih Tsang's writings on land economy

文献	出处	年(期)
土地经济学(专著,1—4版)	上海黎明书局	1930—1934
李嘉图地租定律述评	《商学期刊》	1929 (2)
市地应为公议	《商学期刊》	1930 (3)
上海地产的观察	《地政月刊》	1934 2(5)
今日我国应采之土地金融政策	《经济学季刊》	1936 7(1)

资料来源:作者收集整理。

章植在《自序》中写道，“年来关于土地问题之小册子，为数甚伙，惟系统的著述，尚付阙如。本书之作，在中国或为首次，际此地权辄生问题之秋，或亦为时事所需。是书以土地经济之学理为经，我国之事实为纬，举凡土地上生产分配诸问题，均与以讨论，尤注意于中国之事实，概土地经济学具有应用经济学之性质，略富于地域性也。作者问世日浅，见识狭隘，且迫于衣食，不能专心研究，虽力求系统的论列，俾读者对于土地经济，得一概括的了解；但错误芜杂之处，必不能免，倘能抛砖引玉，得海内贤明，进而教之，则幸矣。”

全书共15章，分土地经济问题、土地经济学与经济学原理、土地之特点及其分类、农地之利用、市地之利用等。书中第681页参考书目处指出“纯粹的土地经济学在中国尚无其书此盖为首本也”。书的版权页也写道，“本书为中国第一部的土地经济学。凡四十余万言，著者费数年心血，始克告成。……全书对于各种土地问题，无不讨论，以中国之事实为根据，而以各国情形为比较，尤为本书特色。”出版时，该书被列入“大学丛书”。初版于1930年9月15日问世，销售良好，1931年春“书局来告，已有再版之必要”。此时《土地法》已颁布，章植在更正第一版书中的错印之处外，在第二版书后加上了土地法、土地法原则的全文。之后该书连续再版，到1934年出了第4版。

①笔者查证发现，章植著《土地经济学》于1930年9月15日出版，早于李达、陈家瓌合译的河田嗣郎著《土地经济论》后者于1930年10月出版。

3 学界对章植著《土地经济学》的评价

邹枋 1931 年指出“近来因为平均地权学说的倡导,都市的渐兴,土地价税的征收,农村经济的凋零,于是我国学者对于土地经济学方面开始加以深切的注意。纵观我国出版界,对于土地经济学部分的探讨,很浅薄的有几本小册子,同时各刊物中也散载关于部分的论述。可是,从整个土地经济学立论的,只有章植著的《土地经济学》,是一本三十万言的巨著”^[7]。心水在《介绍土地经济学》一文中,开门见山指出“这是一本很值得一看的书”,“非但这种学问很新,在我国也很需要。根本上我国以农立国,民生与土地,有很大关系,而事实上在这工商业勃起的历程中,城市的土地,也因人口的集中,而发生问题。总理以平均地权为民生一大政策,要非无故。所以在这个当儿,能有一本较为完备的土地经济学出现,诚如作者所言,能‘合乎时势之需要了’”,介绍该书“在这二十余万言中,差不多把土地经济学的各方面,都加以系统的论列,而对于农地之租佃制,土地价值之构成分子等,尤为精彩,内容丰富,可说是该书的第一个优点。”同时,他指出当时出版界的一种弊端是常不分皂白地把外国材料贩卖进来,强调“本书对于这种毛病,却能避免。其所应用的统计和事实,虽不能说都是十二分的真确,可靠,但在统计荒的中国里,能找出这些比较可靠的材料,亦具见煞费心血。即引证实例,亦能注意国内情形,比那种囫圇吞枣式的贩卖外国货,要好得多,这是本书第二个优点。”“此外还有一二优点,值得一举,就是(一)有系统的组织。土地经济问题,千端万绪,难杂整理,本书能以完正的组,而无脱漏的毛病,良为可贵。(二)对于地权地价的研究。作者对于地权地价,具有相当研究,故所说的话,并非是信口开河,而能折衷不偏。按讨论地权,最易趋于极端。像该书中所说的四大原则,用意故似浅明,但实能中正不偏,颇为难得。”最后他指出该书的缺憾,一是错印的字多了些,二是关于地税的讨论有芜杂的地方,三是书成于土地法颁布以前,故未加论到土地法^[8]。

章著《土地经济学》出版后成了当时各大学、机构研究和传授农业经济、土地经济的重要参考书。朱通九在发表于《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的《怎样研究土地经济?》一文中,列出“预备研究土地经济以前应读的书籍(当然是最低限度)”和“研究土地经济时应读的书籍”共 12 本,除 11 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外,惟一非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即为章植的《土地经济学》^[9]。符致逵在南开大学 1936 年度第 2 学期开设农业经济学课程时,便以该书作为教科书^[10]。另外,《民国丛书》中,朱通九 1933 年编著的《经济概论》将该书列为第 1 本参考书,陈醉云 1936 年编写的《农村经济概论》则将该书列为第 2 本参考书。

也有一些学者对章植的《土地经济学》提出了批评。例如李春泉在 1937 年发表的《评章植土地经济学》中,认为章植“运用了错误的方法论(形而上学观念论),以致必然地接受了错误的经济学原理(心理学派经济原理),结果对于土地经济诸现象不能作深刻地解剖,单能作表面的抽象的理解,因之处理土地经济诸问题不是先后矛盾便是歪曲史事”,又指出“不过国内外关于土地经济学及其相关联的诸科学之一般的及特殊的问题之论著尚不十分发达的现在,这本书虽然错误百出却未尝不能作为一块砖或一片瓦。我希望章先生努力,海内外的土地经济学者努力,在不远的将来能使我们治土地经济学的学生得着一本较好的书读。”^[11]魏方在 1942 年发表于《人与地》的《土地经济学发凡》一文中,指出“以章植的土地经济学为例,材料的搜集颇为丰富,但他的缺点,是没有一贯的中心,对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法,也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一个整个的办法”^[12]。

另一个常提及的话题是章著《土地经济学》与美国学者 Ely 和 Morehouse 合著的 *Elements of Land Economics* 的关系。曾济宽在评河田嗣郎的《土地经济论》时,指出 Ely 和 Morehouse 合著的 *Elements of Land Economics* “曾由章植君以之为蓝本,编译有土地经济学一书,取材极丰,叙述颇侃,可谓为一种百科全书。欲窥土地经济之门径,当先就伊利氏或章植君所编著之土地经济学,取得关于土地之一般经济的智识”^[13]。唐启宇 1933 年介绍《伊利及莫

① 章植先生的外甥徐滇庆教授介绍说,他走上经济研究道路是由于薛暮桥先生的指点。据薛暮桥回忆,薛临解放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秘书长,讨论《中国土地法》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陈翰笙和薛的农村调查工作,批评当时有关土地经济问题的书都“狗屁不通”,说只有章植的书对土地经济问题“一知半解”。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薛将毛泽东的评价告诉章植(薛、章是老乡、好友)时,章一愣,说“怎么只有一知半解”,薛指出那已经是毛泽东给经济学著作的最高评价了。笔者感谢徐滇庆教授接受答复邮件并接受采访。

哈武土地经济学要义》时也指出“章植君所著之土地经济学即以之为蓝本也”^[14]。方显廷说“章植之《土地经济学》(民十九),大部分系根据美国土地经济学权威伊黎氏名著《土地经济学》并酌加中国材料编制而成,内有土地利用、地权、地税及土地政策等章”^[15]。汪经方在1946年7卷第4期《中农月刊》上发表了他对张丕介著《土地经济学导论》的书评,指出“至于我国学者致力于此科学的研究,不过最近十余年间的事。民国十九年章植著土地经济学一书,可以说是国人对此门科学最早一部的著作;……章著的《土地经济学》,内容和叙述体系大多取材于美人伊利的土地经济学纲要,很少自己独到的见解,且该书出版后,迄今将近二十年,甚少修正,所以已有残缺不全之嫌。”^[16]《物调旬刊》1947年第30期发表关于张丕介著《土地经济学导论》的书评,指出“我国学术界注意这门学科,更较欧美各国为迟,所以关于这方面的著作,特为稀少。战前中文出版的《土地经济学》,只有章植的一本,那是翻译美国人伊利的 *Land Economics*”^[17]。

其实,章植对于自己仿照伊利的框架写成《土地经济学》一书是自知而诚实的。李权时在为章植著《土地经济学》写的《李序》里面提到,“我的朋友章植君本来是复旦大学经济系的一位研究员,最近他提出《土地经济学》一书作为硕士论文。我把这篇论文详细看过一遍,觉得它的内容的确是可以称作‘洋洋大观’。据章君自己说,他这篇论文的纲领大致是根据美国西北大学土地经济及公用研究院院长伊利教授所著的一本《土地经济学》的。不错,章君写这篇论文的最初动机,是由于看了伊氏的书及听了我的劝告,不过他这篇论文的内容,的确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我既一方面喜欢章君之能如此努力,实行学术进化的原则,而另一方面又欲为中国的沉闷的出版界恭贺其能出一册关于土地经济的完备参考书”。

另外,虽然章著《土地经济学》一书参考了伊利的框架,但内容却是地道的中国土地问题。在每章的理论探讨之后,他都会回到对中国实际情况的深入剖析。例如,第1章第4节从农业的、都市的、森矿的、分配的不同视角分析了“土地经济问题在我国之重要”;第3章讨论了“我国历史上之土地分类”;第4章详细介绍了“我国利用土地概观”;第5章分析了“我国农业之特性”,详细讨论“我国之农民人口”、“我国之农民生活”、“我国农民之离村”以及“我国农产之分配耕种方法”;第6章讨论了近代与古代“我国都市之性质”;第7章涉及“我国市地分配之臆测”、“我国森林之观察”、“我国林木滥伐之原因”、“我国之矿地利用”、“我国矿业不振原因”;第9章按共有期、部落公有、私有期等阶段分析“我国农地地之变迁”,讨论“历来对于私有农地之反响”、“我国之自耕农——统计与归纳”、租佃制的“我国情形”、包租制和分租制“二者之比较——我国之情形”,余下各章又细细探讨了“我国之林权”、“我国之矿权”、“我国墓地制度之利弊”、“我国之农业信用”、“广州市之地价税”、“我国少矿税”、“我国施行土地增价税应注意之点”、“广州市之土地增值税——批评”、“我国之田赋”、“圈地权——我国之土地收用法”等诸多话题。

邝枋的评论文章指出,章著“纲领是根据伊利的著作《土地经济学》,可是其见解与主张迥然和伊利的不同了”。该文从9个方面简略比较了章著和伊利的《土地经济学》,认为“在伊利的著作,其背景是纯粹站在美国的经济机体上,而本书著者纯粹站在我国的经济机体上”,指出章著优于伊利著作的几个地方,如“著者对于测验土地利用的四种单位……竭力的加以阐明,并用公式图表证明之,为伊利氏所不及”,“由于我国矿产的丰富,采矿事业的幼稚,故著者对于矿地利用较伊利一书为详密”,“许多近现代的事实……本书则搜集较广”,评价“章著的《土地经济学》是有舶来品的优点,而无舶来品的坏性”^[7]。可能正是由于章著的鲜明中国特色,不少经济学大家都将该书误写作《中国土地经济》。例如,马寅初引用章植书上的荒地数据时写作“据章植著《中国土地经济》第九十页上说……”^[18],方显廷在《民元来我国之经济研究》中写道“我国以农立国,农业和土地问题为人所注意。……章植氏的《中国土地经济》,于民国十九年出版,销行甚广”^[19]。

4 1930年以后

《土地经济学》写成后,章植继续在复旦教书,升为副教授,“适逢上海银行行长陈光甫先生对于改善农村经

济亦非常关心,寻觅专家研究。黎明书局中有一侯先生与上海银行研究部经理资耀华先生相熟,提起我的名字,并且将我的著作送给他们看。陈先生看后,立即请我做调查部研究员。”^[1]在上海商业储备银行,章植广泛收集经济资料,对放款有关的重点商品和行业做重点调查,除每周编制金融商情周报、抵押商品述要外,还编列商品丛刊,为银行业做调查研究工作开了先河。1934年资耀华调任天津分行后,章植继任调查处经理^[20]。在当时的上海金融界,章植与章乃器、资耀华、张禹九等人被公认为少壮派。1932年,章植积极参与创办了中国征信所^[21],并于1934年补选为征信所的常务董事^[22]。

1939年,章植随陈光甫赴美,襄助中美经援谈判,在世界贸易公司任高级职员。1944年夏,孔祥熙率团赴美参加为创立国际货币基金和复兴开发银行的世界货币会议,章植受聘担任中国代表团技术专门委员^[23]。吴道存在《嘉村随笔》一文中写道,“章午云(植)学长,现在美国,此次世界货币会议,曾受孔先生之聘,为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随其参加会议,襄助甚力”^[24]。1946年,章植设立海新企业公司,为二战后中国重建进口机器和其他物品。1956年,章植设立新世公司与数十个国家往来贸易^[25]。工作之余,章植还常发文章于《海光》、*Asia and the Americas*和*Contemporary China*等杂志。他1945年写成的*China's Postwar Markets*一书连续印行两版,广受赞扬。P. K. Mok、Kenneth Duncan、Julean Arnold、Li Choh-Ming和Charles K. Moser等都写书评予以肯定。Ethel Ewing博士则在*What to Read on China*一文中推荐了这本书^[26]。后来,章植任复旦大学美国校友会会长。自1982年起,章植多次捐资作为复旦学生赴麻省理工学院深造的奖学金^[27]。《无锡名人词典》写道,他在“中美复交后,积极为祖国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关心祖国教育事业”^[28]。2005年,章植在纽约逝世,享年100岁。

5 结语

在土地经济学术史上,理查德·伊利是公认的土地经济学之父。20世纪20年代,伊利倡导土地经济学研究,创办土地经济学研究所,在开设土地经济学初高级课程、学术刊物创办、“土地经济学丛书”编撰出版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1922年伊利等人的《土地经济学大纲》(3卷油印本)是土地经济学的第一本教科书,1924年伊利和Morehouse合著的《土地经济学基础》正式出版^[29]。几乎与伊利等人在美国大力倡导土地经济学术研究的同一段时间,章植1930年就在中国写出了一部长达三十万言的土地经济学巨著。该书参考伊利1924年出版的《土地经济学》,有继承也有超越,体系完整,层次分明,内容丰富,紧紧抓住中国的现实土地经济问题,写出了中国特色,是一部优秀的土地经济学教科书。或许可以说,章著《土地经济学》将当时中国的土地经济学术研究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之后,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土地经济问题丛生的背景下,经过邹枋、张丕介、吴文晖、李树青、刘潇然、朱剑农等学者的努力,中国土地经济学术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后来中国大陆的土地经济学术研究基本停滞,到1978年之后才复苏,令人扼腕。

正如1942年9月伊黎和魏尔万在他们的《土地经济学》中译本序言中的提醒——“这册书是为美国的读者写的,而所讨论的土地问题,也几乎完全限于美国及加拿大。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比较起来,美国还是一个婴孩”^[30],学科创始人都用自己熟悉的本国或邻国情况来阐释自己的理论,而其他国家的学者引进新的学问时,常要经过漫长的翻译和本土化过程。章植所著的中国第一部土地经济学教科书在吸收西方学术成果的同时,就着眼于中国的土地状况和土地问题,写出了中国特色,是极其难得的。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章氏兄妹. 萱堂集[M]. 自印纪念册,1992,8,18—26.
- [2] 复旦大学章程[M]. 复旦大学,1929,6,15.
- [3] 孙大权. 中国经济学的成长[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479.

① 例如,经济学早在19世纪就传入中国,但明确说明要以本土故事来演绎经济学理论的尝试,却晚得多。笔者所知的只有卢锋的《经济学原理(中国版)》^[31]和李晓西的《宏观经济学(中国版)》^[32]。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 [4] 宋涛. 20世纪中国经济学研究[A]. 宋涛.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经济学·上册[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2005:1-41.
- [5] 胡跃高. 20世纪中国农业科学进展[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68.
- [6] 周诚. 土地经济学原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4.
- [7] 邹枋. 论章著土地经济学的相对论基础[J]. 经济学刊,1931,1(1):1-9.
- [8] 心水. 介绍土地经济学[J]. 复旦大学政治学报,1931,1(1):1-2.
- [9] 朱通九. 怎样研究土地经济?(下)[J]. 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1936(新187号):1-6.
- [10] 王文俊等. 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266.
- [11] 李春泉. 评章植土地经济学[J]. 政治经济月刊,1937,1(3):34-39.
- [12] 魏方. 土地经济学发凡[J]. 人与地,1942,2(9-10):34-38.
- [13] 曾济宽. 土地经济论[J]. 地政月刊,1933,1(7):991-997.
- [14] 唐启宇. 土地经济学要义[J]. 地政月刊,1933,1(8):1131-1133.
- [15] 方显廷. 中国土地问题文献述评[J]. 政治经济学报,3(4):887-941.
- [16] 汪经方,张丕介. 土地经济学导论[J]. 中农月刊,1946,7(4):136-139.
- [17] 土地经济学导论[J]. 物调旬刊,1947(30):17-19.
- [18] 马寅初. 马寅初全集(第五卷)[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481.
- [19] 方显廷. 民元来我国之经济研究[J]. 银行周报,1947,31(4-5):30-34.
- [20]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690,741-743.
- [21] 章立凡. 中国征信业及其开创者章乃器[EB/OL]. <http://mem.netor.com/m/jours/adindex.asp?boardid=2780&joursid=17052>.
- [22] 吴中凡. 中国征信所史料[A].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 经济金融5[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62-371.
- [23] 卫挺生. 卫挺生文存[M]. 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73:564.
- [24] 吴道存. 嘉村随笔[A]. 薛明扬,杨家润. 复旦杂忆[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40-146.
- [25] A Chronology of Chinese-Americans[EB/OL]. <http://www.chiamonline.org/Chronology/1940.htm>
- [26] Ewing, Ethel. What to Read on China[J]. Far Eastern Survey, 1945,14(23):340-341.
- [27] 柯国庆. 95岁章植校友愿捐赠50万美元[EB/OL]. http://www.fudan.edu.cn/fudannews/news_content.php?id=790.
- [28] 赵永良. 无锡名人辞典(二编)[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141.
- [29] 丰雷,张清勇. 理查德·伊利与土地经济学之发轫[J]. 区域经济论丛,2007(5):129-142.
- [30] 伊黎,魏尔万. 原著者写给中文译本序[A]. 伊黎,魏尔万. 土地经济学[M]. 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 [31] 卢锋. 经济学原理(中国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32] 李晓西. 宏观经济学(中国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